

党史、革命斗争史专题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

东征记述

李吉

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审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先锋队

东 征 記 述

李 吉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审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先锋队

东征记述

李吉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审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路11号)

晋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5 1/4 插页8 字数144千字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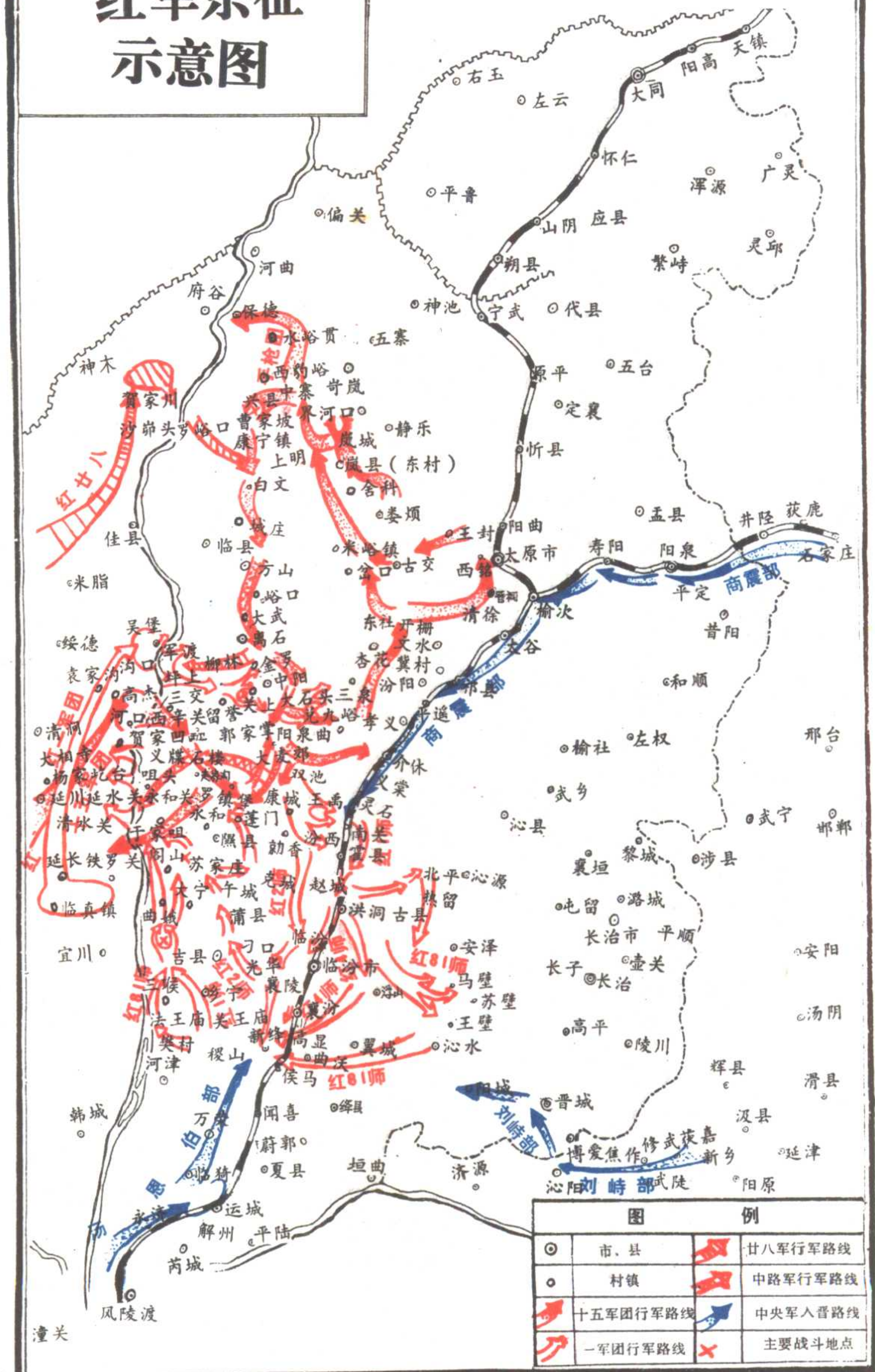
*

印数: 1—2,000册

书号: 3088.461

定价1.25元

红军东征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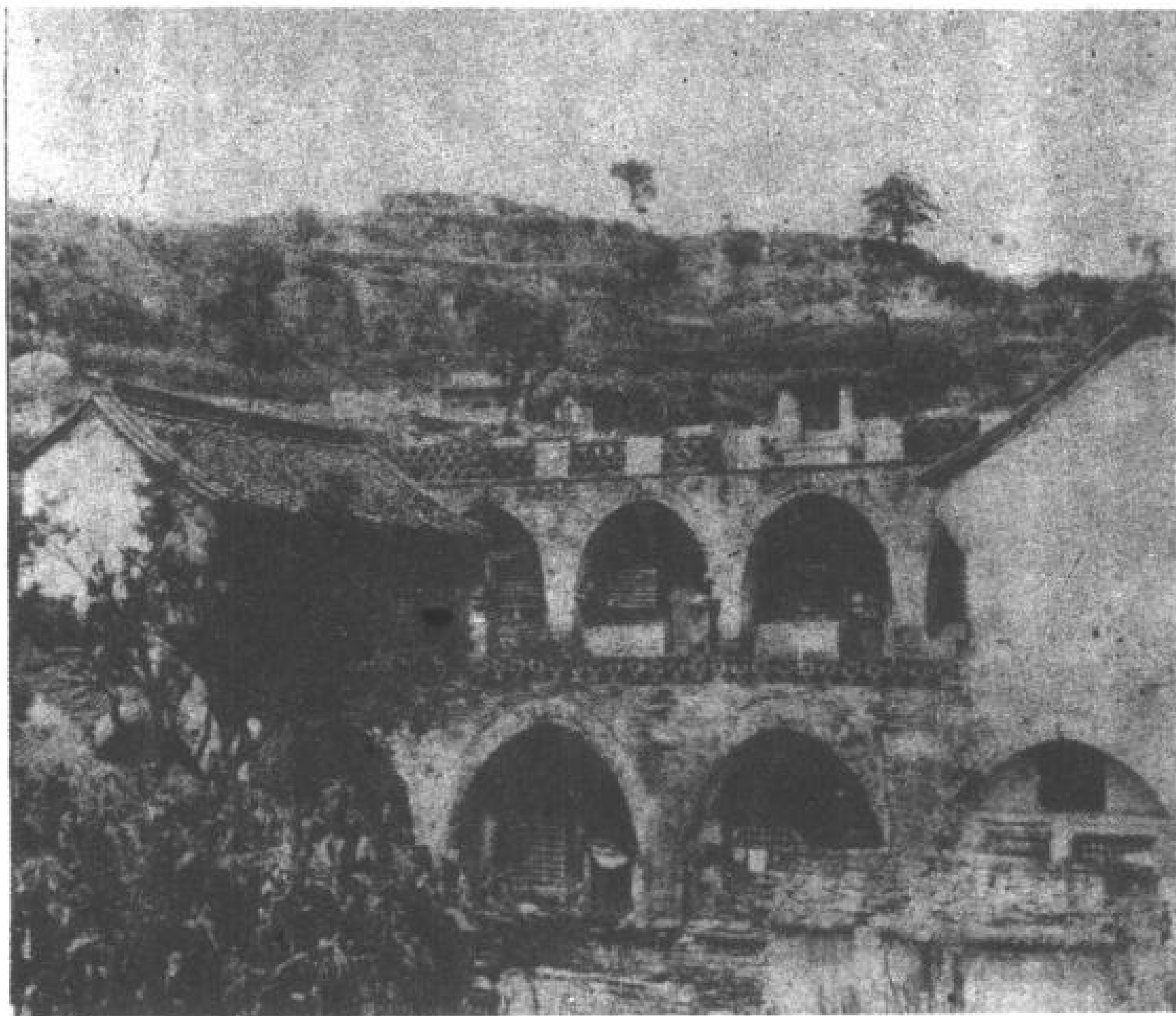




②准备东渡黄河的红军骑兵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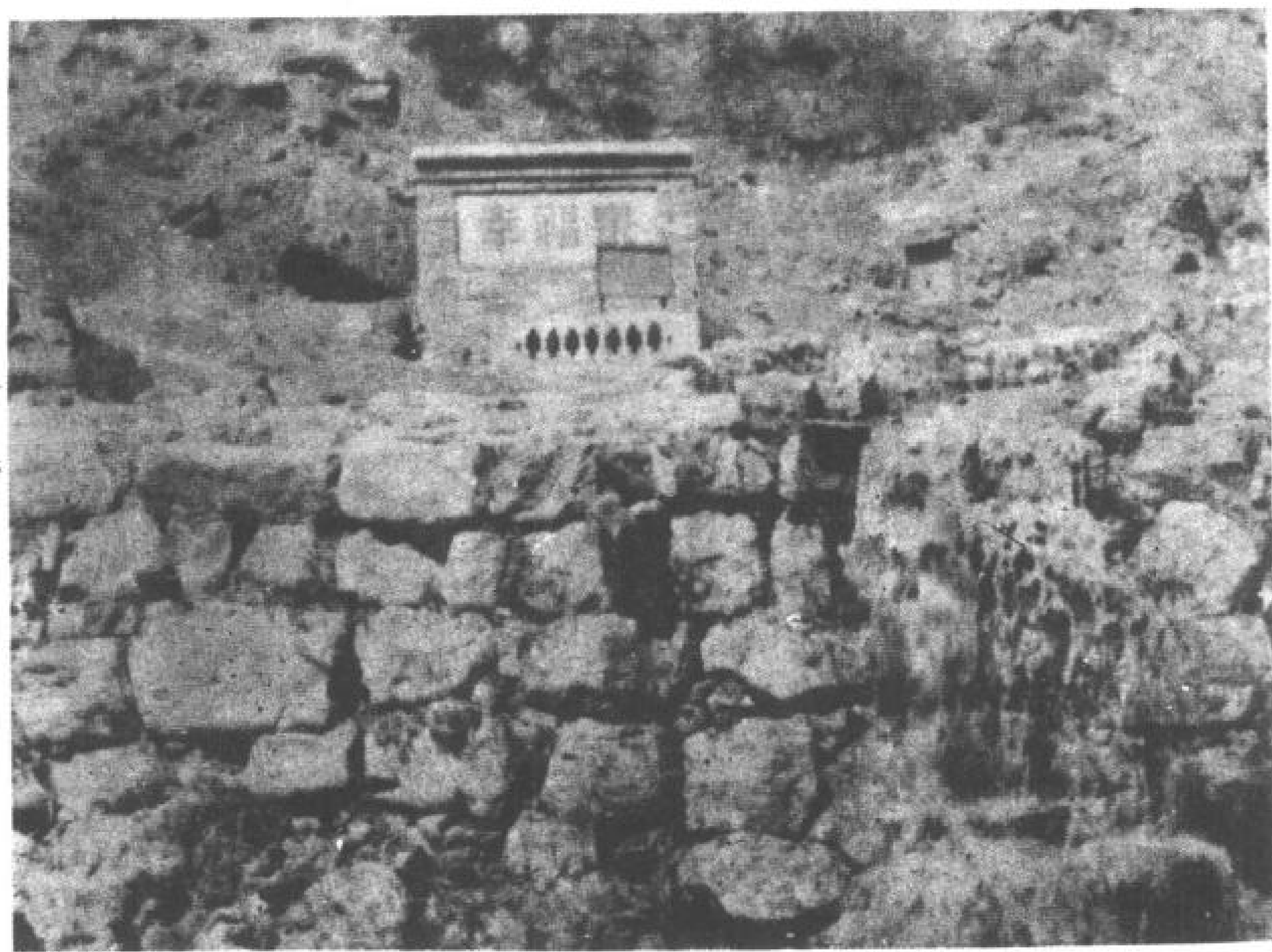


③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司号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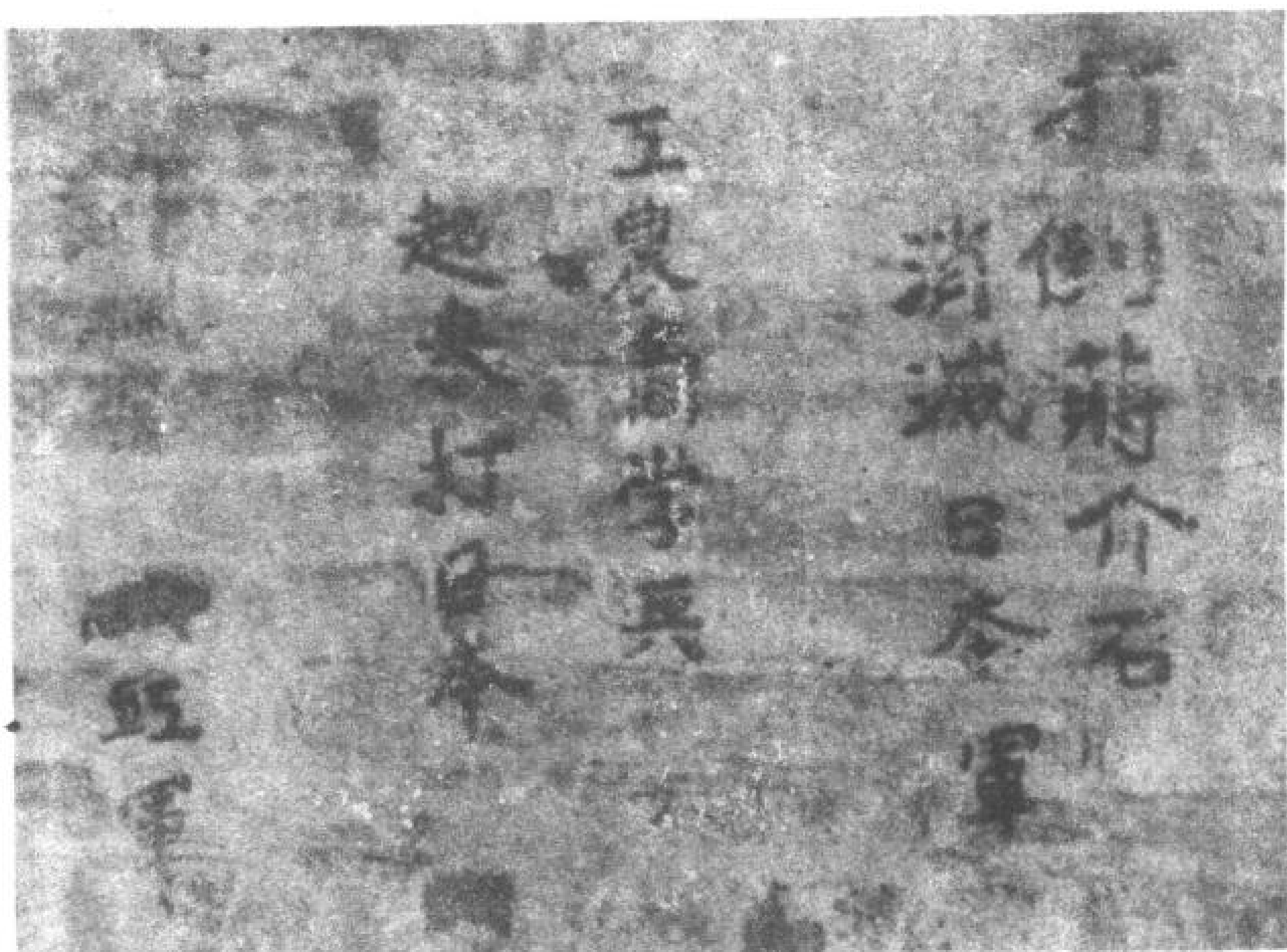


⑥ 东征红军总部驻过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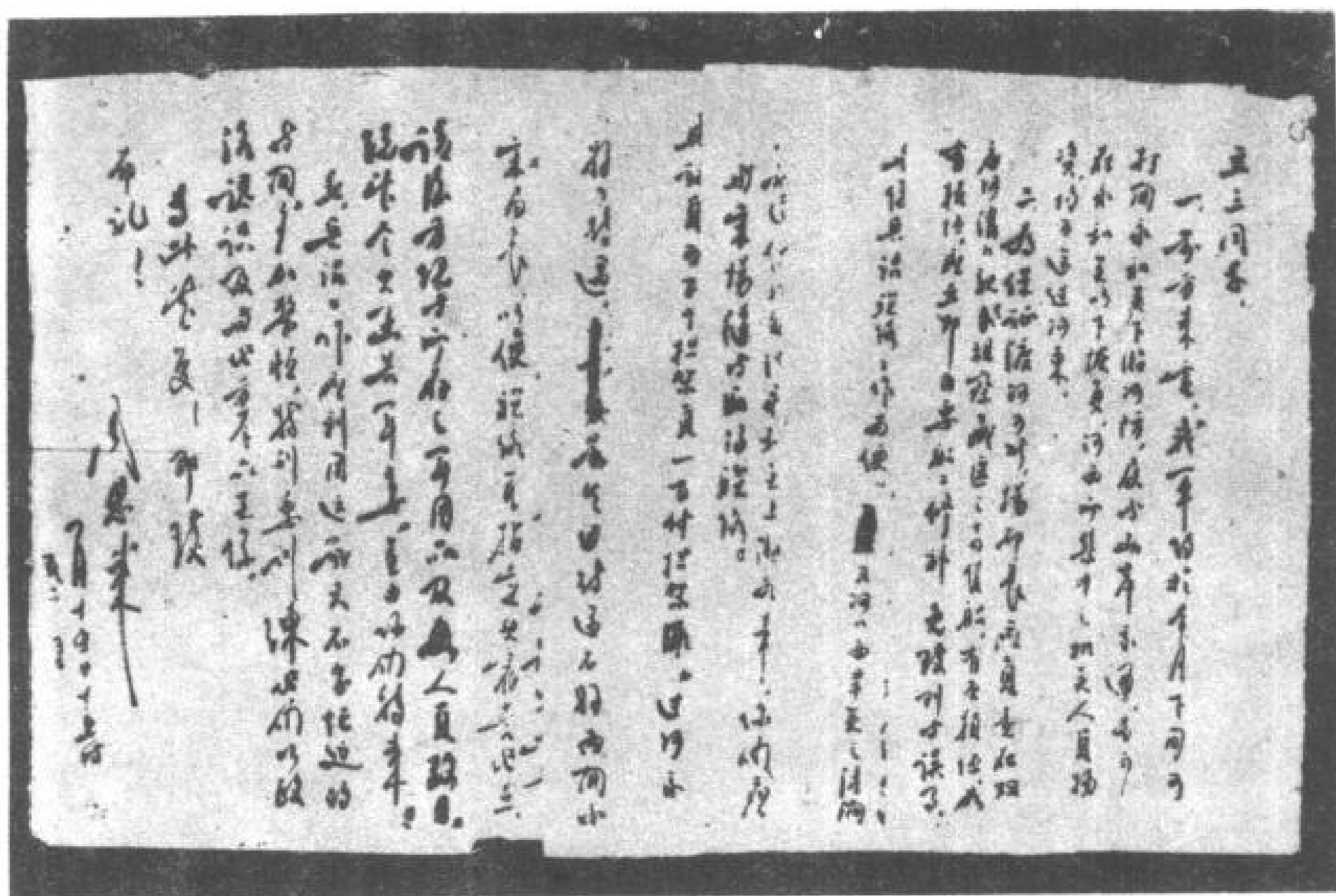
——孝义县康城镇（今交口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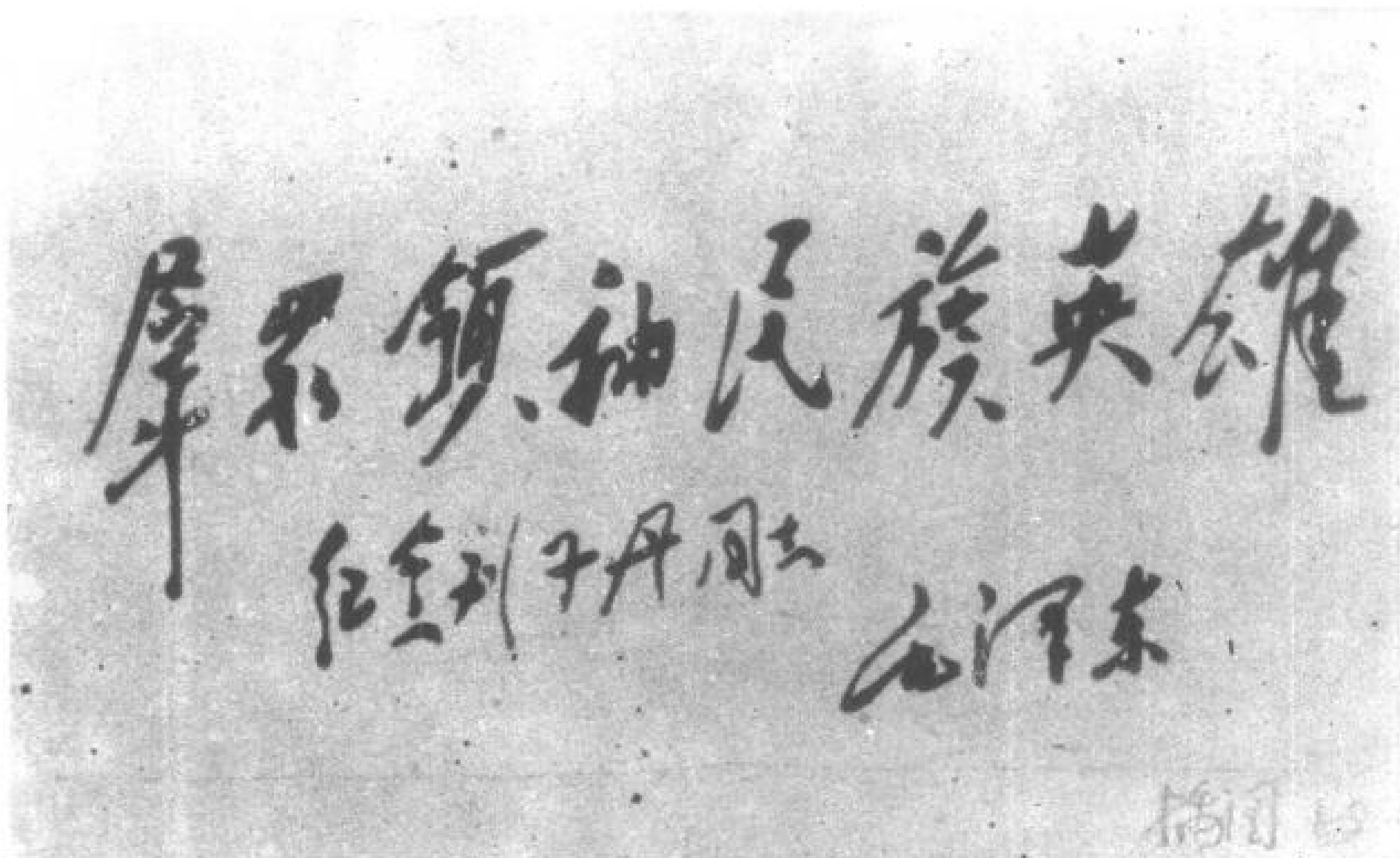
⑦ 幸福泉



⑧东征红军在康城镇墙上写的标语。



⑩红军准备回师陕北后周恩来同志给杨立三同志的亲笔信。



⑨毛泽东同志的题词。



⑪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红军全部回师陕北后发出的一致抗日通电。

目 录

第一章 战 略 抉 择.....	(1)
一、决策东征.....	(1)
二、秣马厉兵.....	(9)
第二章 突 破 天 险.....	(18)
一、山雨欲来.....	(18)
二、飞渡天险.....	(23)
第三章 初 战 吕 梁.....	(35)
一、初战告捷.....	(35)
二、赤化白区.....	(41)
三、重创阎军.....	(50)
第四章 南 下 河 东.....	(62)
一、突破同蒲.....	(62)
二、雄师南下.....	(66)
三、河东扩红.....	(76)
第五章 北 线 征 程.....	(81)
一、挥戈北上.....	(81)
二、偏师东渡.....	(87)
三、康宁歼敌.....	(93)
四、师庄再捷.....	(98)
五、青山喋血.....	(103)
第六章 转 战 晋 西.....	(108)

一、智斗追兵·····	(108)
二、晋西烽火·····	(115)
第七章 逼 蒋 抗 日·····	(122)
一、折冲樽俎·····	(122)
二、运筹帷幄·····	(135)
第八章 回 师 西 渡·····	(143)
一、风雨归程·····	(143)
二、回师西渡·····	(152)
第九章 功 载 史 册·····	(158)

附 录

一、东征大事记·····	(163)
二、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编制序列暨主官姓名表	(177)
三、晋绥军前敌总指挥部编制序列暨主官姓名表···	(179)
四、“防共保卫团”情况统计表·····	(181)
五、援晋中央军统计表·····	(182)
六、东征红军转战山西(县、市、区)统计表·····	(184)

后 记

第一章 战略抉择

一、决策东征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纵容下，得寸进尺，步步进逼，把侵略的魔爪由东北伸向华北，于一九三五年夏秋之际策动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这一工作的对象，是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矩、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商震等华北将领”；“意图是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将日‘满’与华北引向亲善状态”。^①阴谋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日本帝国主义先后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于八月五日又迫使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松井一张允荣协定》，交出口北六县的权力；十月间又在察东策划了“香河暴动”，十一月二十五日扶植大汉奸殷汝耕于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窃据冀东二十二县；十二月十八日又胁迫国民党政府批准成立了半傀儡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以帮助建立“蒙古国”为诱饵，促使与日本早有勾结的蒙族败类——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与日本公开合作，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八旗，为建立“蒙古国”开创独立局面。致使华北上空阴云密布，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为拯救民族的危亡，推动抗日救国运动，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

^①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第六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号召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但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却继续顽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对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同时，又调动陕甘宁青等地方军阀对陕甘苏区进行“围剿”。特别是一九三五年秋，当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界时，蒋介石又将张学良的十几万东北军陆续调入陕甘一带。并于十月间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其统辖范围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个省区，所属部队有西安绥署主任杨虎成部十七路军、青海马步芳、甘南马鸿宾和宁夏马鸿逵等部；另外晋军孙楚所部和陕北井岳秀、高桂滋等地方武装也统归“西北剿总”节制，兵力总数达二十余万。对陕甘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围剿”，陕甘苏区军民在刘志丹等同志的指挥下，沉着应战，奋起反击，先后在慕家垣、定仙塬等地重创晋军，迫使晋军一部退回河东，取得了北线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接着又回师南下，在延川永坪镇与程子华、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会师整编，成立红十五军团。两军会师之后，军威大振，士气益胜，接连取得了劳山、榆林桥大捷，歼敌一个师另四个营，生俘敌军官兵四千余人，敌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均被击毙。敌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沙学良的爱将高福源也被俘获。

正当陕甘苏区军民与国民党部队浴血奋战，拼死保卫苏区的时候，王明“左”倾路线贯彻到了陕北，陕北红军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迫害，陕北红军和苏区受到内外交困的威胁。

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一面指挥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并肩作战，粉碎了国民党

反动派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一面又加强了苏区的各项建设，依据当时的客观情况，调整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迅速纠正了“左”倾路线的一系列错误作法，稳定了苏区的局势。

然而，从陕甘苏区的条件来看，陕北历来就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境内沟壑纵横，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兵匪横行。尤其是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陕北苏区更加贫困不堪。而王明“左”倾路线的一系列错误作法和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恶果，使苏区元气大伤，雪上加霜。再从发展上来看，在这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只有四十余万。除瓦窑堡以外，几乎所有的大小城镇均被敌人占领。陕北苏区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命脉——西（安）肤（施，即延安）公路，也被全部封锁，整个根据地被切成了几块互不连接的地盘，使根据地本身的巩固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再加上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部队减员很大，体质和装备很差，急需扩红休整、筹款补充。而地瘠民贫、交通闭塞的陕北地区，仅能适应小量红军的武装割据，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也无能力解决红军队伍的兵员补充和军需供给。部分地方连人畜吃水都无法满足。根据地军民的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不少从南方长征过来的红军将士，在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仍然是身着单衣，赤足行军。

面对陕北苏区如此窘迫的境地和国内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如何以党和红军现有的力量去发展和扩大陕北苏区，并聚积抗日力量挑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使陕北苏区真正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就成为摆在党和红军面前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围绕这一重大课题和战略抉择，中共中央在召开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之前，曾向各有关方面及军团领导干部征询意见，提出了五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

第一种意见是：离开陕北，到陕南另谋生路。

第二种意见是：确保陕北，向西扩张。向敌人力量软弱的宁夏、甘肃等地区发展，以便建立一个资源较为丰富，地域更为广阔的革命根据地，并进一步向新疆扩展，在西北地区壮大革命力量，创立新的苏区。

第三种意见是立足陕北，向北发展，出兵绥远、内蒙古、察哈尔等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靠拢，以便打通和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支援。毛泽东从当时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时局的基本特点出发，并结合西北和华北地区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第四种意见。即：苏区发展的方向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不宜向南、向北或向西发展，而应该是东渡黄河、开辟吕梁山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向晋中、晋东南或晋西北发展，以便通过河北或察哈尔开赴抗日前线，从而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斗争结合起来。

毛泽东还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具体地提出了整个东征的战略行动，应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

第一阶段是巩固陕甘苏区，准备东渡黄河向西挺进；

第二阶段是大量消灭由军阀阎锡山指挥的晋军，打通抗日道路，并在山西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

第三阶段是扩大战果，向北(或向东)进军，经绥远、察哈尔(或上党地区)开往抗日前线，准备同日军直接作战。按照这一战略方针，红军主力出师东征，不仅可避免同西北地区各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冲突，有助于西北地区、特别是和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且出师东征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阎锡山将入陕的晋军撤回山西，解除陕北苏区东边的威胁。同时，红军入晋的军事行动，也必然使潼关、洛阳等地的蒋介石部队入晋增援，减轻对陕甘一带的军事压力，有利于陕甘苏区的巩固与发展。

再从经济方面来看，由于自中原大战以来，阎锡山二次上台，倡言“十年建设”，发展实业，山西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拥有数以亿计的雄厚资本和相当可观的军事工业，其经济条件较西北各省优裕。渡河东征将会使红军迫在眉睫的筹款、扩红以及物资补充等问题得到解决。

更重要的是山西位于华北腹地，表里山河，形势完固，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垂涎三尺的战略要地，一旦有失，日军将长驱而进，“攫秦搏齐，当者失据”；反之，若红军进据山西，“东出太行，势如建瓴，燕、冀之寇，顿失其势”。因此，山西不仅是东进（或北上）抗日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日的前哨阵地。

另一方面红军渡河东征，抗日讨逆的战略行动必将推动华北以及全国各地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必将得到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把建立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权掌握在我党手中。

毛泽东渡河东征的主张提出之后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与支持。正在甘泉前线负责军事指挥的彭德怀司令员在接到毛泽东关于渡河东征的电报之后，也立即复电中央，表示拥护渡河东征的正确意见。同时，出于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复电中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两点意见和看法：

一是考虑到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之后，部队减员很大，体质较弱，西北红军在连续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之后，也亟需休整和补充。两支红军队伍加在一起总兵力只有一万三千余人，而陕甘苏区周围的敌军总数在二十万人以上，特别是布防于黄河沿线的阎锡山部队早已依据黄河天险构筑了大量的高碉暗堡，严密封锁，以逸待劳。万一红军东渡受挫，不仅军事上受损，政治上也将产生不利后果；

二是担心红军主力东渡之后，蒋介石必定调动大军入晋增援，阻我去路，万一陕甘一带的国民党部队乘虚而入，向陕甘苏区发